

陳寅恪 著

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寅恪 著

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陳寅恪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5 印張 23.75 字數 540,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ISBN 7-5325-0560-x

K·46

定價：13.00 元

前言

(一)

陳寅恪先生，原籍江西修水，一八九〇年七月三日出生于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一八三一—一九〇〇）曾供職曾國藩幕府，後歷任浙江、湖北、直隸按察使、布政使等職。一八九五年就任湖南巡撫，時值維新變法興起，寶箴在湖南興辦新政，設立時務學堂，聘梁啟超爲主教習，又保薦楊銳、劉光第爲清廷軍機章京。戊戌變法失敗後，遭革職永不錄用的處分。父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光緒十二年進士，官授吏部主事，因積極參與維新運動，戊戌年間與寶箴一并被革職處分，遂隱居江西祖家，致力於詩文寫作，名聞一時，有《散原精舍詩》、《散原精舍文集》等流傳於世。這樣的家庭環境，使先生從小受進步思潮的教育，他自稱：「生平爲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固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先生一生經歷大約可分爲四個時期：

一、求學時期

一九〇一年，先生隨父移居金陵，在家塾念書。陳家私塾除四書五經外，還開設數學、英文、音樂、繪畫、文體等課程，故先生同時接受了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科學知識，這種教育系統對知識結

構的平衡大有裨益。

一九〇二年，先生隨兄長衡恪（字師曾，著名畫家）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巢鴨新文學院高中，時年僅十三。兩年後回國度假，并考取了官費重新赴日。一九〇五年患腳氣病回國治療，遂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一九〇九年畢業。次年，得親朋資助，留學歐洲。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西歐各國語言文學。先生學習十分用功，除語言文學外，有關各國社會政治和歷史的書籍亦多所涉及，他在瑞士時便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國人讀德文版《資本論》，先生或許是第一人。當時由于手頭拮据，先生常常半飢半飽，用最節省的方法維持生活，結果腳氣病復發，雖一度療養於挪威但仍未能痊愈，加上其它原因，只好回國，在上海家中自學了一年多。一九一三年再獲出國機會，在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讀了一年，後因歐戰爆發，無法繼續學業，加上江西省教育廳電召先生至南昌閱卷并允補江西省留學官費，故於一九一四年底返回中國。先後在南京、南京、北京等地居住。時長兄衡恪在美術界已頗有名氣，交游魯迅。先生與長兄手足之情最深，生活上多受照顧，由于這種關係，先生與魯迅亦有學術過從。《魯迅日記》一九一五年四月六日載，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即記兩人交往，然先生絕少向人提及此事。

一九一八年先生獲江西省官費得以再度留學。原擬進德國柏林大學，因歐戰尚未結束，轉赴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Lanman）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從這時起，先生專攻中古文學和佛教學。一九二一年轉學於德國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施（Lueders）教授指導下，學習東方古文字長達四

年。這種訓練，使先生後來能廣泛利用多種文字的資料和語言學的知識來佐證歷史，而爲他人所不及。

先生早年四出求學，從不以獵取學位爲目標，故雖留學歐美多年，并無任何頭銜，但其學識却深得國內外學術界人士的推崇。在德國留學時，被譽爲中國留學生中「最有名望的讀書種子」（毛子水《記陳寅恪先生》載《談陳寅恪》）。吳宓於一九一九年在哈佛大學結識先生，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曾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二、清華國學院時期

一九二五年清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聘請最有名望的學者任導師，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當時吳宓爲研究所主任，負責行政工作，與先就任導師的梁啟超一致認爲先生是適當的導師人選，於是向曹雲祥校長鼎力舉薦。先生遂以無學銜的學者身份應聘，於一九二五年返國，適逢父病，請假在杭州家中侍候，至次年六月才正式到校。任導師的除梁啟超外，還有王國維、趙元任。名望最高的推王、梁。先生十分推崇王國維，譽他爲「大師巨匠」，「能開拓學術之宇，補前修未逮。」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先生撰文挽悼，情見於詞，一時傳爲最佳篇章。對梁啟超的學問，先生亦頗稱道，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但對梁在清朝覆滅後的思想行爲不無微辭，曾以「清華學院多英杰，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勛列」之句譏諷他。先生在《豔詩及悼亡詩》中有一段關於社會道德的議論：「縱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

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狀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由於善用或不善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這段話可作爲他對王、梁二人思想行爲評價的注腳，也可從中瞭解先生的社會道德觀，以至歷次社會變革中他所持的立場。

先生潛心於學業，同時自以爲體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至壯年，尚未婚娶。供職研究所時，同事偶然談到女教師唐質（字曉瑩）家懸條幅署名南注生，先生據此推斷唐爲唐景崧孫女。唐景崧乃清末臺灣巡撫，甲午戰爭失敗後領導過反割臺運動。先生曾讀唐景崧《請纓日記》，母舅俞明震乃清代著名學者，又曾在臺與唐景崧同事，故先生頗諳唐氏家世。兩人結識後，自覺志同道合，遂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結婚。婚後陳夫人對先生不僅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在著述上頗多幫助。先生有「然脂功狀可封侯」詩句，便是對陳夫人的稱頌。一九三三年，三立自江西來北京，定居於西四姚家胡同，先生家住清華園，但周末常進城與父親團聚。生活逐漸安定。

清華國學研究所只辦了五年，後因王國維、梁啟超相繼去世，未能聘到名師接任，便宣告停辦。此後，先生爲清華大學歷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并一度在北京大學兼課，一九三〇年以後，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故宮博物館理事、明清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

務。在國際學術界上先生的聲望亦日隆。

先生自執教清華園至「七七事變」後逃亡，在北平工作約十年左右，這一時期是先生從事教學、研究的最初時期，也是富有收獲的時期。北平藏書豐富，比較容易收集各種不同文字的資料和檔案，加上生活安定，妻兒父老團聚，這些都為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環境。十年中，先生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為他人撰寫的序、跋共計五十多篇，後來在抗戰年間發表的著述，其中不少亦是在這一時期醞釀成型的。此外，他還參與主持《明清史料》前數篇的編輯和刊行工作。

三、戰亂流亡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北平被日軍占領。先生一家滯留城中。三立憂憤，不食而死，臨終前還問：外傳我軍馬廠得勝，不知確否？此事對先生影響甚大，數年後日本投降時，先生賦詩曰：「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表現了對國難家仇的銘記。這與散原老人之死的影響，恐不無關係。

治喪完畢，先生一家逃離北平，輾轉半月，始抵清華大學臨時校址長沙，先生的藏書無法帶出，只好託人將常用的分包寄往長沙。結果只收到極少部分。不久，臨時大學遷往蒙自，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先生繞道香港、越南進入雲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到達蒙自，後又遷昆明。此後，生活暫時穩定了一個時期。但研究條件極差。從長沙出來，他帶的書更少，從北平寄出後來才寄到長沙的書，只好存於親戚家裏，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火燒長沙城，先生的書付之一炬。往昆明途中，隨身攜帶二箱最

珍貴的書亦失落。先生讀書常在書上作校釋和心得筆記。這些有眉批的書籍的失落，給先生的研究帶來了巨大損失，殊屬可惜。

先生在西南聯大主要講授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研究和元白詩研究等課程。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不甚好，視力亦大為減弱，在艱難環境中，先生堅持教學和著述。一九三九年寫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幾經周折最後才在重慶出版。

一九三九年，英國牛津大學聘先生為中國史教授，牛津大學聘中國人為教授，這算是第一宗。一九四〇年九月，先生取道香港準備應聘，因戰時交通不便，滯留香港，被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聘為客座教授，不久，許地山逝世，先生接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淪陷期間，先生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日軍部知道他是著名學者，又懂日文，便對他格外優待，在他家門口作一記號，禁止日軍入內。糧食緊缺時，又派人送來兩袋大米，意欲拉攏，但先生把大米推出門外，拒不接受，陳寅恪曾有「正氣狂吞賊」句贈之。困居香港時期，先生終日閉門，或誦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頗有感於建炎年間史事，對積弱受侮於列強，往往唏噓嘆息不已。先生不肯為侵略者服務，乃喬裝為塾師秘密逃離香港。船中作詩「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事實證明，先生的愛國心和民族氣是經得住考驗的。

先生繞道澳門，經廣州灣，於一九四二年七月抵達桂林，以清華大學教授名義任教於廣西大學。逗留桂林期間，曾冒轟炸的危險經湖南到粵北坪石，向遷往該地的中山大學學生講授「清談與清談

誤國」、「五胡問題及其它」等專題。此期間，先生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立論極為精湛，與前所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同為重要的唐史研究著作。此後，研究唐史者多援引先生兩書的基本觀點，而這二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正是在「年復遭際艱危，倉皇轉徙，往日讀史筆記及鳩集之資料等悉已散失」（《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附論》）的流亡環境中寫成的。

作為一個正直的愛國學者，先生十分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從香港回來後，目睹民生日益凋弊，憤慨地寫下「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區」的詩句。

一九四三年，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策劃向蔣介石獻九鼎，想借助文化人士的名聲為蔣介石歌功頌德，曾徵求先生意見，先生寫下《癸未春日感賦》作為回答。詩曰：「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表明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心情及不屑與阿諛者同流合污的高風亮節。

一九四三年九月，先生離桂林往成都，仍以清華大學教授身份執教於燕京大學。顛沛流離的生活，一再摧殘他的健康，所患的視網膜脫離症愈加惡化，正是「七載流離目更昏」，雖就醫於成都存仁醫院，然未能奏效。適逢牛津大學重申前聘，他便想借此機會到英國治眼，遂於一九四五年秋由成都經印飛赴英倫。二十多年前先生游學歐洲時曾到過英國，此次抱着「眼暗猶思得復明」的心情重游舊地，無限感慨。但英國名醫也未能治好先生目疾，最後下了失明已成定論的診斷書，這對一位在學術上壯志未酬的學者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天其度我是耶非，嘆息衰弘強欲違……彈指八年多少

恨，蔡威唯有血沾衣。」先生懷着絕望的心情，辭去牛津大學教席，經美洲回國。一九四六年六月抵達上海，十月重返清華園。

不久，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發動內戰。先生從民族自尊心出發，感到十分不滿和憤慨，毅然在北京高等院校教授支援學生運動的呼吁書上簽名，並參加拒領美援面粉的行列。

一九四八年冬，國民黨政府已處於風雨之中，社會混亂，物價陡漲。先生雖為教授，所得薪俸却難以維持一家溫飽。先生夫婦常發病，不得不出賣珍藏的東方語言書籍，以書款購煤取暖過冬。時北平面臨解放，國民黨政府派一位部長出面勸先生出走，遭先生拒絕，乃改由文人胡適邀先生南下。初抵上海，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聞訊，即聘先生擔任講席，於是復乘船至廣州，時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月，解放大軍越南嶺而下，國民黨政府通過傅斯年多次電催先生逃離廣州。當時，要去臺灣、香港都便當，但先生對國民黨黑暗統治已有深刻認識，在這年夏天所寫的《哀金源》一詩中寫道：「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臺灣非安身之地，而香港又為英國殖民地，先生素鄙殖民地生活，也不肯去香港。愛國心和自尊心使他留了下來。

四、嶺南時期

解放後，先生任嶺南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學生輪流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課程。嶺大學生本來就不多，讀歷史的更少，但先生仍以極認真的態度上課，受業的學生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非常欽佩。一九五〇年五月，特地贈給他一面錦旗，上綉「萬世師表」，表彰

他在教育事業上所作的貢獻。先生一生從事教學三十餘年，培養造就了不少出色的學者，這面錦旗，他是受之無愧的。同年，《元白詩箋證稿》問世，該書首倡詩文證史，成爲他學術上的又一個里程碑。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廣州地區綜合大學命名爲中山大學，先生遂由嶺南大學轉爲中山大學教授，直至逝世。

一九五四年初，中國科學院擬請先生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先生雖懷念「早年眠食地」北京，但他已習慣嶺南的氣候和生活環境，又自以爲不適應當時的政治學習等行政工作，推辭不就，乃推薦陳垣教授代任。由於先生在學術上的杰出成就，他被選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還在不同時期擔任中央文史副館長、《歷史研究》編委會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務。黨和政府以及學校負責人對先生十分關心，爲他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專門安排兩位助手幫助他著述和整理舊稿，又挑選了一間適宜他活動的房子給他居住，并特意在屋前草地上修了一條塗白色的的小道以便他在散步時易於辨認。許多領導人曾多次登門看望先生，關懷他的生活和工作。經過歷年戰爭流離，終於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先生對此頗感滿意，作詩曰：「餘年若可長如此，何物人間更欲求。」一九六二年，先生不慎跌斷右股小骨，醫院擬定了治療方案送國務院，由周總理親自裁定。對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愛護，先生是十分感謝的。然而，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對新社會不習慣產生誤解，甚至某些抵觸，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左傾路線干擾下執行一些錯誤政策和作法時，更引起他的懷疑和不滿，加上他一生經歷坎坷曲折，清末家庭變故，戰亂流亡生活，失明多

病的打擊等等，也都助長他思想上的消極情緒，故晚年詩作比較消沉。「非死非生又一秋，不夷不惠更堪羞」，「我今自號過時人，一榻蕭然了此身」等詩句流露了他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此外，他寫《論再生緣》，借作者陳端生的遭遇懷自己身世，亦與現實生活顯得不協調。盡管如此，他和黨始終保持良好的關係。一九五五年，他自擬一聯貼在門口：「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表現了他對政局的樂觀態度。一九五九年《論再生緣》油印稿流出香港後，被某出版商據以翻印并加了「關於出版的語」，大意云大陸學術界失去自由，先生知此書在海外傳播當樂為默許等等。先生知道後，對出版的語頗為不滿，并向學校領導說明自己無意在香港出書。當時，學校黨委書記馮乃超指出：「出版的話無非想挑撥先生和黨的關係，并表示黨信任他，不會讓別人挑撥得逞。先生表示同意這一分析。」事後，先生還對夫人說：「黨的信任令他感動。」

十年浩劫期間，先生橫遭迫害。他的身體在腿骨折斷後一直很虛弱，受此衝擊更加不行了。與他相依為命的陳夫人身體亦每況愈下。一九六九年，先生自知不久於人世，曾擬一聯送其夫人：「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真是一字一淚，哀思動人。陳夫人也對人說：「待把寅恪的事辦完，我也要跟着去了。」是年十月七日，先生因心力衰竭和腸梗阻在廣州逝世，終年八十歲，全國政協為此發了訃告。臨終前囑咐把他在廣州的藏書全數贈給中山大學圖書館。先生遺體火化後一月餘，陳夫人因悲傷過度，心臟病發，也溘然而逝。

粉碎四人幫後，組織上為先生作了徹底的平反。他的未刊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別傳》和修訂

稿《金明館叢稿》已陸續出版并廣爲傳誦。他數十年來培養的弟子，不少已創造了新成就，大可告慰於九泉。而他淵博的學識、正直的人格以及其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都永遠令人尊敬和懷念。

(一)

先生一生研究的範圍甚廣，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宗教史與西域民族史 先生最初以中古佛教史和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崛起於史學界。先生在歐美所師事諸名家，大都以宗教史、民族史見長，如路德施研究佛教典籍，繆勒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民族，黑尼士研究元朝史等等。時先生雖專攻語言文字，但自稱所注意者二：一歷史，一佛教。他學習東方古文字時，常用一佛教典籍的不同文字譯本相比較閱讀，以掌握語言規律及變化，因而熟習佛教內典，對中亞史地及民族亦有涉獵。這些學科，當時國內鮮有人爲，而先生的東方文字學，特別是梵文的功力之深，在國內幾無可企及，也蜚聲於國際學術界。回國初年，先生着手推進這些開拓性的學科。在清華國學院首開的課程有《佛經翻譯文學》、《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等；指導研究生也有涉及宗教與西域民族史的。先生最初發表的三篇學術論文，如《大乘稻芋經隨聽疏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童受喻論梵文殘本版》也都與佛教史的研究有關。先生對佛教史的研究

大抵有以下幾個成就。(一)文字校勘和考證。早在留德年間，先生便注意到中古佛經的誤譯問題，一九二三年《與妹書》中先生寫道：「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先生從事佛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比勘異同，印證文句，如中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原本有「無上」一詞，而斯坦因從黑城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譯為「最上」，先生依據其豐富的語言學知識，指出該詞為梵文 *anuttara*，藏文為 *Bla-na-med-pa*。梵文 *uttara* 源出 *ud*，其最高級為 *utama*，比較級為 *utara*，在比較級前加 *am*（意為「無」）便成 *anuttara*，意為「無更上」。從語法功能上看，是以比較級形式表達最高級，中文「無上」取直譯，而西夏文「最上」取意譯，或合乎西夏文語法習慣。這一番考證，不但解釋了佛經的內涵，而且揭示了中文、藏文譯梵文經籍時所用的不同方法之習慣。

先生對佛教文字的考證固十分精湛，但他不囿於單純的文字考證，而是力圖通過考證來說明社會文化現象。如《三國志·司馬芝傳》載：「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繫獄」。先生考證了「無潤神」本為「無間神」。無間神又稱為地獄神，為梵文 *Avici* 的意譯，音譯為阿鼻，亦意譯為「泰山」，常見於漢魏六朝內典外書。并依此推出東漢末年，佛教已頗流行於宮掖婦女之間。又指出三國名醫華佗二字實來自天竺語 *agada*，意為「藥」，漢譯時脫去字首元音「a（阿）」即為華佗。華佗原名華夷，因醫術高明，人們將其比附於印度神話中的藥神。至於竹林七賢，先生指出雖有七賢存在，但竹林一詞則是假託佛教名詞 *Veluvana* 的譯語，是佛祖釋迦牟尼說法的地方。七賢大談

之道，故以Velu-詞比附，遂有竹林之游一說。此數例便可見先生語言功力深厚，運用於史事解說，自有不少創見。

佛教與中古文學 佛學與文學的關係是先生研究有素的題目，其首開課程便是《佛經翻譯文學》。先生認為中古佛教的流傳，對文學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體裁上皆產生重大影響。在內容上，許多中國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都可溯源於佛經故事。如《西遊記》中玄奘三弟子，孫悟空的原型為印度著名敘事史詩《羅摩延傳》第六篇中的工巧猿，合併了《賢愚經·頂生王緣品》中頂生王升天爭位的故事，遂有猿猴大鬧天宮一節；猪八戒高家莊招親則由《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三佛制苾芻發不應長緣「中牛卧苾芻」的故事演變而來；慈恩法師流沙河誦經去惡鬼的故事則為沙和尚故事之起源。先生不僅分析了其淵源關係，並依此推出文學故事演變之公式：簡單縱貫式，復雜縱貫式和混合橫通式，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關於體裁，先生通過研究佛典中長行與偈頌相間的形式以及向說經文體的遞嬗，指出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正是說經文體的一種結構。散文偶雜詩歌，則為說經文體的另一種結構，詩文合體則為中國彈詞的前身。先生又分析了一家傳體的演義小說如《楊家將》等與《維摩詰經》上原始流別得變遷程序的相似性。此外，先生對中國哲理小說、長篇小說的內容和結構都與佛經故事作了比較研究，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啓發的起點。

佛教與社會文化 先生致力於佛教史研究，並不是對佛教本身特別感興趣，而是借佛教來解釋

社會歷史的一般狀況。先生特別注意佛教所代表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接觸的問題，認為外來文化必須與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得以流傳。如早期所譯佛經常有道教詞彙，用「道」字釋「菩提」等。蓋因佛教初入中國，名詞翻譯往往依託較為近似的老莊，以期得解，後教義學說漸普及，乃專用對音譯經。同時又指出外來文化必須適應本土文化的需要而有所揚棄。他通過比較敦煌寫本《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與巴利文《涕利伽陀》中的「蓮花色尼」篇，發現中文本闕去一種惡報，即蓮花色尼屢嫁，而所生子女皆離失，不復相識，復與其所生子女共嫁於其所生之子，迨既發覺，乃羞惡而出家。先生認為這一段載於偽頌本文，決非注解或後來附會之事，且為蓮花色尼出家的關鍵所在，是全篇最要者，斷不容略去。敦煌本所載其它各節與巴利文本略同，唯獨闕去這一節，也并非偶然遺漏，而是由於這一節與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觀念相衝突而故意刪去。此外，佛教教義「無父無君」、「沙門不拜」、「沙門不敬王者」等亦皆與中國傳統的忠君孝親觀念不相容而不得不摒棄。先生不僅注意到外來文化被本土文化同化的現象，也注意到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影響和改造，如借用佛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釋莊子之《逍遙遊》，便是以佛釋道之一例，天臺宗也是佛教華化的結果。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調查報告》一文，先生明確地指出：「釋迦之教義……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這一論斷不僅揭示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也揭示了一般文化傳播的規律。